

王民信著

契丹史論叢

學海出版社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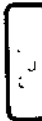
契丹史論叢

# 契丹史論叢

著者：王 氏 信  
出版者：學 海 出 版 社  
代表人：李 善 齋  
發行所：學 海 出 版 社

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一五七巷七之三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一四三二五四號

定價：新台幣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六月初版  
內政部核准登記證爲內版臺業字一五〇七號

# 契丹史論叢目錄

從遼史論文目錄看契丹史研究——「代序」	一
契丹民族溯源	一一
契丹古八部與大賀遙輦迭刺的關係	三五
遙輦阻午可汗二十部考	六三
契丹外戚集團的形成	七三
契丹的柴册儀與再生儀	八八
遼史韓知古傳及其世系證補	一一八
遼史「契丹語官名」雜考	一三五
遼史研究論文目錄（附專書目錄）	一八三

## 從遼史論文目錄看契丹史研究

契丹，在元魏（拓拔氏）時出現在現今的熱河省境，中原朝代的更迭，經歷了四百多年（四五三—九〇七），終於趁着唐朝末期的混亂，他在長城以外建立了國家，其疆域由原活動地帶的熱河省四向擴張，同時，也伸出腳向長城以內來試探試探，最後如願以償，獲得了長城以內大片土地，同時也把國號定名為遼，在宋建國後，儼然以大國的姿態與宋對抗。最後，宋人亦屈服其淫威下，每年乖乖的送上歲幣，以求得長時期的苟安。當西夏問題困擾着宋朝時，契丹扮着調解紛爭的重要角色，同時，也獲得了厚利。不勞而獲，固然使契丹財富增加，隨着財富的增加，其國力反而逐漸萎縮，終於步上了滅亡途徑。兩百多年（九〇七—一二二五）的一統江山，被東面新興起的女真民族所代替。其後，耶律大石的西竄，在中亞建立了西遼（哈刺契丹），延長了遼朝的國運，由於蒙元的興起，在一二二一年（即宋天禧三十四年、元太祖六年）也結束了這偏安的局面，從此，在蒙古人的領導下，契丹人隨着四處漂泊，又默默無聞的消失在人海裡。歐洲人嘗稱中國人為「契丹」Cathay，如「漢」如「唐」一樣，那也是一個很光榮的稱謂，可惜那光榮的稱謂，也與漢唐的輝煌歷史一樣，早已隨風而逝，所留下的，亦僅是片片而模糊的回憶而已。

契丹亡國後，蒙古人也為他們修訂了「遼史」，滿州人統治中國後，也將遼史納入了正

統歷史——即正史的範疇，然而傳統的中國斷代史，國人研究者甚夥，獨遼史的整理和研究則頗乏其人，馮家昇在「我的研究東北史地的計劃」（禹貢卷一第十期）裏會談及此一現象謂：

(一)遼史爲前人所不讀，向來是廿四史中的一部廢書，裏邊問題太多，又太複雜，讀的時候，牽衣掛肘，很不方便。

(二)遼史雖然分量不大，但生澀的部族名詞却比前史多得多。

「遼史雖然分量不大」，也就說明了研究遼史，其資料缺乏是造成乏人問津的原因之一。的確，一部百十六卷的遼史，全部不及四十萬字（概略估計），要想從此區區的數字中去瞭解長達兩百餘年的陌生契丹民族的歷史，的確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何況其「生澀的部族名詞却比前史更多」，而其中的「問題太多，又太複雜」？此種困難的造成，遼宋時期彼此的書禁或爲其主要原因（參閱劉銘恕「宋代出版法及對遼金之書禁」），元好問云：「遼人主盟二百年，其間可記之事多矣……太平中詔修遼史，書成，尋有南遷之變，簡冊散失，世不復見，今人語遼史，至不知起滅凡幾……正大初，予爲史院編修官，當時九朝實錄已具，正書藏祕閣，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後，又復與遼書等矣」（元文類卷五一元好問「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已修遼史既二遭厄運，故元人重修遼史時，所據資料就很成問題了。如清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六「遼史」條云：

考遼制書禁甚嚴，凡國人著述，惟聽刊行於禁內，有傳於鄰境者罪至死。蓋國之虛實，

不以示敵，用意至深，然以此不流播於天下，迨五京兵燹之後，遂至舊章散失，漸滅無遺。觀賁稱修三史議，蘇天爵修三史質疑，知遠代載籍可備修史之資料寥寥無幾，故當時所據，惟耶律儼陳大任二家之書……

儘管元好問以宋人「通鑑長編所附見，及亡遼錄、北顧備問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辭」（見前「耶律公墓誌銘」），未可盡信，若真無此類著作遺世，則後人對亡遼的歷史文化之認識，則更行缺如了。劉銘恕談及此事時謂「以今觀之，宋人所傳誹謗之辭，亦未可厚非矣」。

遼史的資料既然貧乏，除「遼史」外，就是繆荃孫輯「遼文存」、王仁俊輯「遼文萃」、黃任恒輯「遼文補錄」、羅振玉輯「遼帝后哀冊文錄」、金毓黻輯「遼陵石刻集錄」、羅福頤輯「遼文續拾」、陳衍輯「遼詩紀事」、陳述輯「遼文集」，然此等輯錄初皆重「文」，至金石出土，遼人所遺留的碑誌則更增加了遼史的內容，碑誌中最可貴者是契丹字碑文，日後有能識其字讀其音者，則契丹語言問題及契丹民族的歸屬或可迎刃而解也。遼人遺留史料既乏，則「未可盡信」的宋人記述仍是有參攷的價值。此類記述一為「籍諸一二北使節人之見聞的記憶，歸而述之於筆墨者」，一為「歸化人之關於北朝方面的著作」（參攷劉銘恕文章），然此等著述甚夥，而留存者却不多，葉隆禮會據以成「契丹國志二十七卷」，厲鶚會廣泛搜尋輯「遼史拾遺二十四卷」，楊復吉復補輯「遼史拾遺補五卷」（馮家昇遼史初校序引）丙善本書室藏書志語謂仍有很多遺漏，「此書當可更續也」，遼史資料雖未大備，然研究遼史者於資料稍有選擇之餘地也。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收集了很多遼及宋遼關係的資

料，惜平原書佚失，今存者僅從永樂大典輯錄之部份而已，陶晉生王民信復將此不完整的長編所記遼及宋遼資料輯錄以付梓，異日若能據此以廣事增補，於研究遼史或宋遼關係者將更有所裨益焉。馮家昇「遼史初校」與羅繼祖「遼史校勘記」的問世，使讀遼史者減除不少困擾，然「牽衣掛肘」的情形仍有存在，若輔以日本若城久治即所編「遼史索引」（以上三書大華書局有翻印），於研究遼史者會有着更多的方便。除了資料的補輯與資料的比勘外，史料的整理或增補亦屬很重要的事情。繆荃孫「遼史藝文志」、王仁俊「遼史藝文志補證」、黃仁恒「補遼史經籍志」、羅福頤「遼史彙目」（其他尚有倪燦盧文昭、金門詔、錢大昕、厲鶚、楊復吉等所著錄部份。參攷世界書局中國目錄學「遼金元藝文志」）旨在補遼史所缺「藝文志」；佚名、吳廷燮「遼方鎮年表」、羅繼祖「遼漢臣世系表」旨在補遼史諸表之不逮；錢大昕「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考」、汪遠孫「遼史紀年表」、黃任恒「遼代年表」旨在匡正遼史之訛缺；楊守敬「遼地理志圖」、李慎儒、劉師培「遼史地理考」、譚其驥「遼史地理志補正」、馮家昇「遼金史地理志互證」等旨在匡正遼史地理志之訛誤，傅樂煥「宋遼聘使表稿」、聶崇歧「宋遼交聘表」、張亮采「補遼交聘表」、吳徵鑄「補遼史交聘表」為遼史外交史料方面添了新頁，譚其驥「訂正皇子表」、「補皇子傳」、「訂正皇族表」（見遼史訂補三種）、李守祺「補遼史列傳醫師篇」、「補遼史列傳史官篇」、陳述「遼史補注」等仍求廣大遼史的篇幅。

談到研究，或許宋人的材料較遼人為多，是以，研究遼宋關係者，多從漢人的角度去研



究。王育伊「宋史地理志燕雲路集證」、「石晉割賂契丹地與宋燕雲兩路範圍不同辨」、沈忱「論燕雲十六州的割讓與收復」、李榮村「略述燕雲十六州」、侯仁之「燕雲十六州」、趙鐵寒「燕雲十六州的地理分析」等差不多都是在討論石晉割讓燕雲十六州的方位及其得失；宋常廉「高梁河戰役考釋」、余遜「北宋抗拒契丹侵略的楊家將」、吳晗「陣圖和宋遼戰爭」、姚從吾「楊繼業保衛國土」、「富弼」、陳子展「兩宋外禍史料」、啓循「北宋初期兩次出兵收復長城的經過」、程光裕「宋太宗征遼戰績考」、「澶淵之盟與天書」、趙之蘭「澶淵之盟以前的宋遼之外交關係」、蔣復璁「宋眞宗與澶淵之盟」、蘇夢庵「寇準畢士安與澶淵之盟」、錢君曄「寇準與澶淵之盟」、羅煌「關於宋遼高梁河之戰」、都是以宋人想收復燕雲十六州爲主要關鍵，即是北宋末期，常爲人所談論的，如吳景宏「宋金攻遼之外交」、「宋徽宗朝北盟本末」、徐玉虎「宋金海上聯盟的概況」、張天祐「宋金海上聯盟的研究」、程溯洛「北宋聯金攻遼的外交」、趙鐵寒「宋金海上之盟始末記」亦抱有同樣的目的。不幸的是宋人失敗了，趙之蘭「宋對遼的歲幣、禮物及賜與」、王桐齡「宋遼之關係」、卞孝萱「五代時期南方諸國與契丹的關係」、陶晉生「余靖與宋遼夏外交」、齊覺生「北宋聯制與買和外交」、樓桐孫「一件國難外交的史實」、盧逮會「五代十國對遼的外交」與閻沁恒「北宋對遼塘埭設施之研究」、趙振績「宋代屯田與邊防之重要性」分別爲宋人的失敗解決了部份問題。只有姚從吾「從宋人所記燕雲十六州淪入契丹後的實況看遼宋關係」才注意到生活在此區的苦難人民。同時在「阿保機與後唐使臣姚坤會見談話集錄」、「遼金元時期通事考

」及劉子健「對於北宋大臣通契丹語的問題」等文中解除了二國間交往的主要媒介（通契丹語與通事），毛汝「遼人漢化考」、尹克明「契丹漢化考略」、姚從吾「契丹漢化的分析」則着重契丹與漢人接觸後所沾染上的漢化成分，陳述「阿保機與李克用盟結兄弟之年及其背盟之推測」、傅樂煥「宋人使遼語錄」、傅斯年「宋遼外交文書考」、趙之蘭「宋遼秘密貿易」、「澶淵之盟以來宋遼的榷場貿易」、劉銘恕「宋代出版法對遼金之書禁」、「宋代遼金文之南漸」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瞭解遼宋之關係，題目新鮮可人。其實，在講遼宋關係時，就以燕雲十六州爲重心，尚有很多問題待人研究，遼人據有燕薊之地後，對於契丹人的國計民生社會發生了何種程度的變化？宋人無法挽回既失的領土，對於河北一地的人民生活困擾、社會浮沉以及北宋的國運有何影響，此不是一二篇文章就可以交待得清楚。顯然的，這一廣大的空白歷史，還需要研究宋史遼史的人來多多填補。

站在契丹的立場來研究遼史的，有王日蔚「契丹與回鶻關係考」、王民信「契丹民族溯源」、「契丹古八部與大賀遙輦迭刺的關係」、「遙輦阻午可汗二十部考」、「契丹外戚集團的形成」、王國維「遼金時代蒙古考」、方壯猷「契丹民族考」、李符桐「奚部族及其與遼朝關係之探討」、「回紇與遼朝建國之關係」、李學智「遼代之兀惹城及曷蘇館考」、金毓黻「遼部族考」、陳述「論達斡爾的族屬問題（分類於契丹）」、「越里野利逸利越利諸族考」、盛夔子「契丹源流說」、馮家昇「太陽契丹考釋」、「契丹名號考釋」、蔡美彪「遼金石刻中的韃靼」、馮承鈞「遼金北邊部族考」、譚禾子「遼代東蒙南滿境內之民族雜處」等文章，彼

等或追究契丹民族的源始、或分析契丹內屬的諸部族，外轄的諸屬國，希能於契丹的組成成份、及其所轄子民有更多的認識，不過此一環工作仍不夠，馮家昇嘗謂「契丹在東北是一個承前啓後的民族，我們看前史的記載，有好許多部族，自從被契丹吞併，遼史以後也就不見了」（見我的研究東北史地的計劃），他想用「搜集並整理材料」與「遊歷攷察」的方式欲「得到滿意的結果」，顯然的，由於國家多難，他並未「得到」，其與美人 Karl A. Wittfogel 合著的遼代中國社會史（*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亦只注意到遼史部份名詞的註釋及翻譯而已。楊家駱「遼史世表長箋」、王吉林「遼史世表探微」都是在為「遼史長箋」（楊著「編著遼史長箋的意義」）開路，欲恢復遼朝的歷史，之前有陳述「遼史補注」（陳寅恪有「遼史補註序」），總之，其箋註所補的資料仍是元好問所謂的「未可盡信」之辭，然此「未可盡信」之辭，於研究契丹與漢人交往的關係時，仍有着可資參考的價值。姚從吾「說阿保機時代的漢城」、趙衛邦「契丹國家的形成」等對於阿保機建國的艱辛固能體會，李家祺「對遼穆宗行為試作精神分析」、吳平「遼承天太后主政時期之內政」、姚從吾「遼道宗宣懿皇后十香詞冤獄的文化分析」與王吉林「今存遼史記傳之證補與有關佛教史料之研究」、王民信「遼史韓知古傳及其世系證補」、金毓黻「略論近期出土的遼國歷史人物」、「遼國駙馬贈衛國王墓誌銘考證」、畢任庸「遼韓瑜韓椅墓誌銘考證」，對於遼朝國運之延長亦能有或多或少的認識，魏洪禎「論契丹對於漢人之待遇及其影響」旨在調整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相輔關係，在立國過程中，陳述「論契丹之選汗

大會與帝位繼承」、姚從吾「契丹君位繼承問題的分析」、「說遼朝的世選制度」、楊志玖「阿保機即位考辨」確定了統治者傳位的方向，張亮采「遼代漢人樞密院之研究」、韓道誠「遼代北面官制研究」、陳述「遼金制度考釋序」欲探討遼朝官制的形成。假如要明白契丹設職設官的功能，可能要從「小處着手」去細加分析才能辦得到。在財經社會方面，有王家琦「遼代賦稅考」、左宜「遼金元時中央官工業行政機構」、李文信「遼瓷簡述」、秦佩珩「遼代貨幣新考」、陳陸竈「遼幽州市客房例」、黎士棟「遼代幣制概況」、傅衣凌「遼代奴隸考」、曾資生「遼金元時財務行政制度概況」、「遼金初期的社會經濟概況」、暉軒「契丹民族之社會經濟的結構」、劉興唐「遼金礦業之史的考察」、戴博望「遼金元征服中國後田賦制度檢討」、華山「阿保機建國前契丹社會試探」等文章，其後陳述成書的「契丹社會經濟史稿」雖然觀點不同，但却能概括此方面的內容。在養材方面有高時良「遼金元清時代之中國學制」，在取材方面有方壯猷「遼金元科舉年表」、朱子方「遼科舉制度雜考」、沈兼士「遼金元的考試制度」、李家祺「遼朝科舉考」、陳東原「遼金元之科舉與教育」，在考材方面有曾資生「宋遼金元的考核制度概況」可資參攷。朱子方「遼金元亂軍」、谷霽光「遼金元亂軍史料補釋」、林瑞翰「遼代兵制」、陳述「頭下考」、「頭下釋義」、「亂軍考釋」、「曳落河考釋及其相關諸問題」、韓道誠「契丹兵制研究」、「契丹軍事上的特質」、「契丹軍事考」、陳劍新「遼金馬政」等文章可能看出契丹強盛的原因所在，從王吉林「今存遼史記傳之證補與有關佛教史料之研究」、李龍範「遼金佛教之二重體制與漢族文化」、范午「宋遼金

元道教年表」、奉寬「舊京西山故翠微寺畫像千佛塔記跋」、問耕「遼金崇佛」、韓道誠「契丹佛教發展考」、魏洪禎「契丹之佛教」頗能看出佛道之囂張，由佛教之盛行亦看出遼之以佛亡。契丹的捺鉢文化從傳樂煥的「遼代四時捺鉢考」開端後，其「廣平淀考」、于景讓「牛魚考」、王民信「契丹的柴册儀與再生儀」、林瑞翰「契丹民族的再生禮」、徐世勳「契丹先世的神話及其發生之時代」、姚從吾「契丹人的捺鉢生活與若干特殊習俗」、「說契丹的捺鉢文化」、馮家昇「契丹祀天之俗與其宗教神話風俗之關係」、劉銘恕「契丹民族喪葬制度之變遷及其特點」、「遼代帝后之再生儀」、「遼代之頭鵝宴與頭魚宴」、錢公來「東北史話（遼人殉國）」、盧傑「（遼南京）涼殿廣釋」、戴瑞生「契丹歲時雜儀考」、韓道誠「契丹禮俗考」、「契丹禮俗與漢化」、韓燾「由蹕林看契丹與鮮卑匈奴同俗」等文章都是想更深入的瞭解捺鉢文化所蘊藏的細節，大體說來，姚從吾「遼朝契丹族的捺鉢文化與軍事組織世選習慣兩元政治及游牧社會中的禮俗生活」更能讓人認識此捺鉢文化的全貌及其精神所在。姚從吾「遼金元疆域沿革與地理因素對當時文化的關係」則從地理環境去瞭解遼朝的文化。從契丹字碑文出土後，卞鴻儒「熱河林丹契丹國書墓誌跋」、王靜如「遼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國字哀册初釋」、「契丹國字再釋」、怡生「遼陵契丹文碑刻」、柳翼謀「契丹字大小字考」、星槎「關於契丹國書的介紹」、厲鼎燿「讀日本羽田博士契丹文字之新資料書后」、「熱河契丹國書碑考」、「義縣出契丹文墓誌銘考釋」、羅福頤「契丹國書管窺」等都希望能對契丹文字能有所瞭解，無奈此文有如天書，欲識其字其意甚覺困難，方壯

猷「契丹民族考」、王民信「遼史契丹語官名雜考」欲從比較語言學去瞭解契丹的已知名詞，也同樣的遭受着無法克服的困難。於遼文學方面有陳荆鴻「遼金詩概述」、陳衍「遼詩記事敘」、劉溶池「遼代之詩」、「遼代文學簡編」、顧敦錄「遼文學」、蘇雪林「遼文學概述」、「遼金元文學史」及吳梅「遼金元文學史」，於延長遼朝國運的有胡秋原「耶律大石新傳——附西遼年表」、唐長孺「耶律大石年譜」、郜英「讀西遼史節記」、岑仲勉「讀西遼史書所見」、郭殿章「梁園東著西遼史雜記」、趙振績「北遼成立與消失經過考」、「西北遼與殘遼考」及梁園東譯「西遼史」等文章以資參攷。

顧頡剛寫「當代中國史學」時，於遼金史的研究，讚賞「陳述傅樂煥兩先生的成就最多」，傅氏的「捺鉢文化」為研究遼史者開拓一新方向，陳述晚出的「契丹史論證稿」也為我們揭發了契丹的不少祕密；顧氏於馮家昇則以「對於遼史研究的貢獻亦大」，而馮氏晚出的「中國遼代社會史（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足可媲美於傅氏陳氏之研究而無愧。顧氏於譚其驤張亮采則以「用功益勤」讚之，其他者似有不足道之謂，然晚於「當代中國史學」的劉銘恕，其契丹捺鉢文化的探究亦有其特殊成就，姚從吾「遼史講義」從契丹人的立場來建立遼朝的歷史，盡量放棄傳統的漢族中心主義的思想，取客觀而公正的態度，這對於國史的擴大另闢了蹊徑（陳芳明「姚著遼朝史評介」批評得很得體）。

附：本文所引「論文」依照原目錄作者筆劃次序排列，故有晚出的文章而名列於先者。

## 契丹民族溯源

陳述契丹史論證稿（註一）曾提及「契丹名號之初見」（註二）問題，分（甲）始於元魏說、（乙）諸可寶之推論及其駁議、（丙）契丹之名當先於元魏建號等目次以討論。陳氏的意見，以爲「按魏書體例，四夷諸傳皆甚詳贍，惟此最初之契丹傳，並未言契丹之先，由何而來，契丹名號何時聞於中土，遂使契丹歷史，爲之縮減。實則聞於中原以前，必當先有此號，此號之前，必先有此集羣，而魏書爲之列傳，更爲較後之事」。因而論證契丹民族之出現，應早於元魏。最後復取金史卷六七奚回離保傳「奚與契丹俱起，在元魏時號庫莫奚」及同傳末「替」謂「庫莫奚契丹起於漢末，盛於隋唐之間……」等語來印證。顯然的，陳述是相信「遼金二史修於同時，其言或有所據」，換言之，陳氏以爲契丹民族的名號既見於元魏時期，其民族的存在應在此名號出現之前，「依次序說，邏輯上當是如此」（註三）。很奇怪的，陳氏既然相信元人修的遼金史所載的說法，爲什麼不採用新唐書「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部酋軻比能桀驁，爲幽州刺史王雄所殺，部衆遂微，逃潢水之南，黃龍之北……至元魏，自號曰契丹」（註四）的說法，將契丹的歷史直接遠溯到元魏以前？陳氏之末如此，顯然是有所顧忌，因爲新唐書明白記載「至元魏，自號曰契丹」，是已說明契丹的名號是自元魏始。即使是照陳氏的邏輯來說，這一「集羣」必

先於元魏而存在，也很難將契丹名號遠溯到漢末，倒不如用金史奚回離保傳贊的「起於漢末」來得更爲穩當。記載契丹國事最早的是魏書，據該書卷一百契丹傳云：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異種同類，俱竄於松漠之間。登國中，國軍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分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多爲盜寇。眞君以來，求朝獻，歲貢名馬。

北史卷八二也有契丹傳，所記事與魏書大致相同，惟「俱竄於松漠之間」前，有「並爲慕容晃所破」等七字。北史原錄自魏書，今本魏書無此七字，顯然是漏刻所致。慕容晃是北燕主，其行事據晉書卷一百九載記云：

……又率騎二萬，親伐宇文歸（按：卽宇文逸豆歸），以翰及垂爲前鋒，歸使其驍將涉突于盡衆拒翰，騁馳遣謂翰曰：「突于雄悍，宜小避之。待虜勢驕，然後取也。」翰曰：「歸之精銳盡於此，今若寇之，則歸可不勞兵而滅。突于突有虛名，其實易與耳。不宜縱敵，挫吾兵氣。」於是前戰，斬突于，盡俘其衆。歸遠遁漠北，騁開地千里，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魏書卷一百三匈奴宇文莫槐傳亦云：

乞得龜敗，別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建國八年，晃伐逸豆歸，逸豆歸拒之，爲晃所敗，殺其驍將涉亦于。逸豆歸遠遁漠北，遂奔高麗。晃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自此散滅矣。

兩傳中均無「契丹」名稱，但是有「逸豆歸」人名，陳氏遂以當時的「侯豆歸、乞得龜、乞



特龜、逸豆歸、悉獨官當爲一語」，而「逸豆、乞得、悉獨等，設非尊號如呼韓邪之例，可  
能是契丹之別譯」，更進而認定係「鮮卑或宇文之人，因監轄契丹，可爲契丹之歸」，此與  
「蒙古人名南家者，不謂即南家人也」情形相同（註五）。顯然的，這是附會馮家昇「契丹  
爲宇文部酋名之衍變」（註六）而成。「建國」是元魏昭成皇帝什翼犍的年號，建國八年即  
東晉穆帝永和元年，西元三四五年。以「契丹」爲「契丹之歸」演變而來，管理契丹的人既  
然可以稱爲「契丹歸」，那麼，爲什麼沒有管理「庫莫奚歸」或其他的「××歸」？今既無  
「庫莫奚歸」名稱，可見「契丹歸」也完全是片面的推測。

魏書契丹傳稱「登國中，國軍大破之」，「登國」是元魏太祖道武帝年號，計登國凡十  
年，檢視魏書太祖紀（註七），登國年間無征討契丹的記載，但有征討庫莫奚的事，時登國  
三年（註八）。何以魏書太祖紀無征討契丹的記載？征討庫莫奚與征討契丹是否是一回事？  
據我的推測，征討庫莫奚與征討契丹應是一件事。太祖本紀之無征討契丹，實在是因爲契丹  
名號尚無，而契丹傳裏有「登國中，國軍大破之」的記載，這或許是受了傳首「契丹國在庫  
莫奚東，異種同類」的影響。以登國中曾伐庫莫奚，當然也會伐契丹，這完全是「想當然」  
而已，但是，其推理是可以成立的，因爲，契丹民族早於名號而成在故。雖如是，這對於契  
丹名號的出現，並沒有多大幫助。登國三年，即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西元三八八年。

楊家駱遼史世表長箋裏，曾統計過「契丹」一詞：晉書載記凡四見，十六國春秋輯補凡五  
見（註九）。其年代最早的是慕容熙載記（楊氏誤作慕容盛載記）的「從征高句驪、契丹